

## 淺談鄭振鐸先生收藏的兩種佛典的史料價值

李際寧

**內容提要：**鄭振鐸先生的藏書甚富，而對於佛教典籍的收藏更是明清以來眾多收藏家難以企及的。本文介紹了鄭振鐸先生收藏的兩件佛典，以揭示西諦所藏佛典在文物文獻等方面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鄭振鐸 佛教典籍 楊璉真佳 天龍山藏經

鄭振鐸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學家，在他一生收集、研究的古籍中，釋家類典籍的收藏可謂豐富而系統，據筆者觀察，他收藏的佛教典籍之宏富，是明清以來許多著名收藏家難以企及的。翻開《西諦書目》數一下<sup>①</sup>，先生收藏的釋家類典籍多到140餘種。先生非常重視各種佛經版本的蒐集，重視佛教典籍在中國雕版印刷史上的突出貢獻。先生還重視佛教典籍的版畫，他認為，宗教版畫，特別是佛教版畫，豐富了中國各個時期的版畫藝術風格<sup>②</sup>。趙萬里先生在總結鄭振鐸收藏歷代版畫的成就時說：“西諦對於歷代版畫書籍，有豐富的收藏和深邃的研究……他藏的宋版陀羅尼經、元版磧砂藏的扉畫，以及明初北京出版的帶有圖像的佛教宣傳小冊子，綫條剛柔兼施，刀法明快流利，代表着各個不同時地的藝術風格。”<sup>③</sup>

筆者8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來，工作在此，長期浸漬於國圖宏富藏書之中。出於專業愛好，非常關注西諦藏書中的佛教典籍，在學習研究過程中，常常感慨西諦藏書中佛教典籍的重要。值此先生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暨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的時刻，筆者不揣簡陋，撰此小文，試舉兩例，簡要介紹筆者學習西諦先生收藏的佛教典籍資料後得到的一點體會，以此揭示先生的收藏品在文物價值、文獻價值方面的重要地位，聊以寄託一個後來者對先生一生愛書聚書、以生命保護古籍、傳播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崇高品德的景仰。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 存一卷：七十三 千字文號“臣三”

（唐）釋實叉難陀譯

宋平江路磧砂延聖院刊大藏本<sup>④</sup>

本冊經折裝。卷首有扉畫，經文卷端下刊千字文編號“臣三”，首題後版心下有人名刻工名“蔣達”<sup>⑤</sup>。

本冊《磧砂藏》有兩個重要價值，特別值得介紹。

第一，本冊為宋版《磧砂藏·大方廣佛華嚴經》本，極為少見，具有重要版本價值。

《磧砂藏》於南宋嘉定九年（1216）在平江府陳胡磧砂延聖院開雕，初始階段雕版事業進展緩慢，一些早期刊雕的大經，比如《大般若波羅蜜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等，陸續被請印流傳。寶祐六年（1258），磧砂延聖院發生火災，寺內建築大部分被燒毀，惟獨懺殿和寂堂和尚舍利塔未火。這次大火給寺院大藏經雕版事業打擊嚴重，學術界一般認為，現在存留的《磧砂藏》南宋原版《大般若波羅蜜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等經板，幾乎就在這次火中全部燒毀。

咸淳（1266—1274）初，主持僧可樞化緣修復寺院，不久又恢復了刻經活動。但是沒有多久，公元1279年，蒙古大軍南下，南宋滅亡。朝代更替，人民塗炭，磧砂延聖院的刊經活動全部停止。直到元代大德年間，刊經活動斷續恢復，原來已經燒毀闕板的板，用距離磧砂延聖院不遠的妙嚴寺本配補，後續尚未刊板的經典，募緣刊造。大德十年後，松江僧錄管主八介入補刊續雕活動，他的兒子又在其身後將二十八函“秘密經”板捨入磧砂嚴聖寺，配入印刷，補刊《磧砂藏》的工程方告完畢。

今天，全世界保存的幾部比較完整的《磧砂藏》，以及許多單位收藏的零本，其中的幾部大經幾乎全部是後配本。後配本的情況，見載於妙嚴寺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之首：“曩因《華嚴》板行於世，繼刊《涅槃》、《寶積》、《般若》等經，慮其大繁義廣，不無魯魚亥豕之訛。謹按已畢，……今改而正諸，庶幾後賢讀之，當以自勉毋忽焉。至順三年（1332）龍集壬申七月日吳興妙嚴寺經坊謹志。”<sup>⑥</sup>妙嚴寺為元代寺院，歷來有趙孟頫書“妙嚴寺碑”傳世，是了解該寺歷史的重要資料。妙嚴寺不是一個大寺，沒有太多的經濟實力刊造全部大藏經，先刊行了八十卷本的《華嚴經》，後又用“大都弘法、南山普寧、思溪法寶、古閩東禪、磧砂延聖之大藏，重複校讎”《涅槃》、《寶積》、《般若》等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包含四大部經典的“小部藏典”。元代大德十年以後，凡流通的《磧砂藏》，幾乎都用“妙嚴寺本”配入補闕，至少從目前已經公佈的資料看確是如此。反而，宋刊原版的幾部大經倒罕有傳世，特別是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就更稀如星鳳。鄭振鐸先生獨具慧眼，收藏到這一冊宋版《華嚴經》，成為宋版的罕見“標本”，以後凡宋版與元版的比較，都離不開此本，其文物價值、文獻價值俱在普通版本之上，可謂價值連城。

第二，本冊扉畫極為稀見，是重要的文物歷史資料。

本冊卷首的扉畫，一紙五半葉，由兩部分組成，其中右邊三個半葉的主題是佛說法圖，左邊兩半葉主題反映的是元初在杭州大萬壽寺校勘藏經的情況。扉畫四週邊框較粗，以陰刻蔓草紋為裝飾，左邊有一行題識：“都功德主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楊璉真佳。”

以楊璉真佳為主題出現的版畫，在古籍中非常罕見，以筆者調查經歷，僅僅見到兩種，另一種是幾冊零本《普寧藏》所附的“釋迦牟尼供養圖”<sup>⑦</sup>，在諸供養人中，有兩

位人物做髡髮狀，其中一人的旁邊，標注着“總統永福大師”字樣。這位“總統永福大師”，就是前述《磧砂藏》扉畫提到的“都功德主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楊璉真佳”。

楊璉真佳的資料在學術史上有什麼意義？楊璉真佳，亦作“楊輦真伽”、“楊璉真伽”<sup>⑧</sup>。《元史》卷二百二記載：“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南宋一朝以杭州爲都城，杭州城週圍南宋一代的文物古跡最豐富，幾代宗室的陵墓，亦修在杭州紹興一帶。元人爲了牢固統治江南地區，除了在治國政策上採取對漢族和江南地區人民殘酷壓迫以外，還採取了楊璉真佳的主意，開發宋陵，希冀從民族感情方面打擊南宋故地人民對前朝的寄託，從根上“挖斷”漢族統治世系的脈絡。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一記載：“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佔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鄰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載取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並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明史》卷二八五：“夏人楊輦真伽爲江南總攝，悉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哀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壓勝，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三《列傳》第一百四十四釋老記載：“有楊璉真伽者，世祖爲江南釋教總統，掘趙氏諸陵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貨無算；其壤奪盜取者，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址兩、鈔一十一萬六行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乾二萬三千戶。”

楊璉真佳得到元朝統治者的重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忽必烈的宗教政策有關。元代統治者，利用各宗教之間的關係，達到鞏固元朝統治者的目的，這個政策的標誌，體現在元朝政府封藏族佛教大師膽八爲“國師”，封楊璉真佳爲“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挖掘宋陵後，又在宋代宮禁內修造佛塔。明田汝成輯撰《西湖遊覽志》第七卷“報國寺”條下記：“報國寺，元至元十三年，從胡僧楊璉真佳請，即宋故內建五寺，曰報國、曰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楊璉真佳廢宋韋太后所建四聖延祥觀，改爲了萬壽寺。萬壽寺在有元一代曾經有過重要的活動，著名的河西字大藏經，就是在這裏刊雕完畢。國家圖書館藏磧砂藏本《大宗地玄文本論》卷第三卷尾有大德十年宣授松江府僧錄管主八題記曰：“管主八……欽觀聖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諸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施於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裝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傘蓋》三十餘件、經咒各千餘部；散施土蕃等處，流通讀誦。”這裏管主八所謂之“江

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經板”一事，就是鄭振鐸先生收藏之《磧砂藏》本開篇扉畫中所描述的情景，這個萬壽寺，就是楊璉真佳廢宋四聖延祥觀改建的。

西夏崇尚佛教，西夏國時期，多代統治者刊雕西夏文佛教大藏經，事未竟而西夏國亡，一直到大德年間，重在杭州大萬壽寺開板，續修西夏文大藏經及其他零種佛典。據西夏史專家史金波先生研究，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有題款“實勾管作選字出力者”，這個“選字出力者”就是揀排活字的工匠。日本收藏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有題款兩行，史金波翻譯為：“都發令雕碎字、勾管作印者都羅慧性，復共一切發願助隨喜者，皆當共成佛道。”“雕碎字”者，即指造活字。過去，史料中有關記載在杭州刊雕西夏文大藏經的資料甚少，而鄭先生收藏的這幅版畫，正細緻真實地反映了元代統治者在杭州大萬壽寺刊雕大藏經的情景，異常寶貴。

另外，有關楊璉真佳的族屬問題，曾經在史學界有過爭論，陳高華先生持西夏人說。他的觀點，現在被大多數學者支持。他認為：“楊氏應是河西唐兀人。”他認為元代畏兀兒名詩人貫雲石在《道隆觀記》中所說“河西祝發楊永福總攝江南僧政”，明言楊璉真佳為河西人，即西夏人。筆者非常同意陳先生的觀點。筆者在此僅補一例。前此我們曾經介紹了國家圖書館等單位收藏的《普寧藏》的扉畫，圖中有發願人呈“髡髮”狀，旁邊提“總統永福大師”者，這個人就是楊璉真佳，而髡髮是西夏人一個非常明顯的標誌。這也可以解釋，何以楊璉真佳如此熱心補刊河西字大藏經的工程。

鄭振鐸先生收藏的本冊《大方廣佛華嚴經》，不僅文物史料價值高，而且同樣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藝術價值。

## 二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八十 存一卷：四十八 千字文號“育”

（唐）釋實叉難陀譯

明建文年間杭州天龍禪寺刊本

本冊磁青封面，經折裝。經名箋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等八字。經文每紙五個半葉，半葉六行，上下單邊。通卷經文句讀，卷尾有經文句義。卷首有扉畫，扉畫一紙五個半葉，為供養圖。圖畫中間釋迦牟尼高坐蓮花寶座，雙手微微平舉，寶座前有二供養人。釋迦牟尼左右各一人，手執如意，坐蓮花臺上，此或即天台宗所立三身佛，兩側各有數名弟子及供養菩薩。人物綫條細膩流暢，面目表情栩栩如生。邊框左下角刊雕畫工姓名籍貫“鑒湖張敬書”。扉畫之次綴接半葉紙，印有萬歲龍牌，牌上楷書大字“皇帝萬歲”。

此經版本，胡適先生稱為“天龍山藏經”。《天龍山藏經》過去未為學界瞭解。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胡適先生在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書庫擔任庫長期間，對該書庫收藏的原北京大悲寺藏《磧砂版大藏經》進行了調查，發現該館收藏的《磧砂藏》中配補有明代建文帝元年（1399）刊本佛教藏經——《天龍山藏》。胡適先生在他的《記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葛思德東方書庫藏的磧砂藏經原本》一文中介紹了這部佛典：

“配補的明本之中，還有建文元年己卯刻的《天龍山藏經》。因為成祖要毀滅建文一代的事實，故建文兩字都被挖去了，祇剩元年己卯的紀年。這是很少見的史料。”<sup>⑨</sup>胡適關於《天龍山藏經》的介紹，只有這麼幾句。在他的這篇文章發表以前，學界未見有關這部藏經的任何介紹。而他的這篇文章，也是迄今為止研究《天龍山藏經》的少有論述，因此，更顯鄭振鐸先生收藏品的重要。

巧合的是，國家圖書館也收藏着十二冊《天龍山藏經》零本：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卷七十二、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八、卷七十九、卷八十。版本學的一個方法是比較，即用相關版本相互比較，往往能夠“拼湊”出已經零星破碎的、被遺忘的資料。當我們把這些相關資料資訊“湊”在一起，這些版本的史學價值就慢慢顯示了出來。

國家圖書館《華嚴經》卷一尾題後的牌記，記載了該經的主持者和開雕地點。該牌記為蓮花底座，上覆荷葉。牌記內有三行文字：“謹募眾緣，重刊大經全部，功德仰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眾生饒益者。/元年己卯歲春，天龍禪寺主持比丘行滿敬識。”//牌記邊框外右側刊“板留杭州府城南天龍寺”，左側刊“余姚夏伯堅刻”。根據牌記知道，比丘行滿是天龍禪寺的主持。釋行滿，歷代僧史傳記不載，其活動時期及刊經史事亦不詳。從這些題記看，這部藏經的主持者就是這位杭州府城南西湖南山天龍禪寺的僧行滿。元末明初著名學者徐一夔《始豐稿》有“天龍禪寺記”一篇，記述頗詳：“寺在慈雲嶺之陽，後據龍山，前挹浙江，幽夔蕭灑。唐真覺禪師卓錫於此，始建道場。……錢武肅王時，欲廣禪舍，乃新茲寺以居鏡清禪師……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寺額為感業……建炎三年毀於兵，惟木觀音像在。紹興十三年建園壇，以淨明寺為齋宮寺臨淨明，歲時侍從齋宿僧徒勿便，多散處它處，寺亦日久入於廢。……泰定三年，遷寺於舊基之東若干步，即宋郊祀時侍從齋宿地也。……今住山行滿既加塗墍，寺視舊益新。……”

《天龍山藏經》在刊刻過程中，得到了廣大信眾的支援。助緣刊經者，主要是本府錢塘縣、仁和縣信徒與寺戶，也有其他地區的助緣百姓。如卷七十六題記載助刊者：

仁和縣居住善人賀氏妙堅、何氏妙善、徐氏妙林、傅壽、錢氏七娘、朱氏妙善、管氏妙真、蔣覺圓、李士賢、董氏妙堅、蔡氏妙寧、陳實、鄭氏妙緣、王氏妙真、陳氏妙蓮；海寧章廣誠、胡氏妙安、凌氏四娘、沈氏三娘、吳亮、葛文名、章嗣良、周氏妙福、張士亮、凌氏妙濟、嚴氏妙真；湖州歸安范氏一娘；各施淨財，助刊此經，同增見世福田，共證來生妙果者。

又如卷七十七題記載，僅天龍禪寺本寺的助刊淨人就達二十三人。助刊者還有寺院僧人，如卷二題記：“京都僧錄司左覺義雞鳴禪寺住山定嚴淨戒助刊。”當時助刊的範圍並不大，主要是杭州府附近的百姓。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次刊經活動的影響並不大。

《天龍山藏經》的開雕時間，根據卷一“元年己卯歲春”的提法，可以肯定在明代建文帝元年。這個年號還見於卷七十二題記：“元年己卯正月吉辰天龍住山行滿題”，以及卷八十題記：“元年己卯春天龍住山行滿題”等。至於《天龍山藏經》板片刊刻完

畢時間，由於現有資料較少，沒有明確記載，故尚難確定。

《天龍山藏經》是“小藏”，主要根據就是其卷一牌記的“重刊大經全部”一句。根據方廣錫先生的觀點，判斷一部藏經需本三個基本要素：其一是入藏經典的取捨標準，其二是組織藏典的結構體系，其三是反映藏典結構的外部標誌<sup>①</sup>。依照此一標準，《天龍山藏經》在經典的組織上是經過取捨的，所取者就是“大經全部”，也就是說，該藏應該也是以四大部為基本主體而組織起來的，應該是“小部藏典”。國家圖書館這十二冊《大方廣佛華嚴經》，有千字文編號，卷一編為“拱一”，卷八十編號“臣十”。這個千字文編號與宋元明以來幾部主要大藏經相同，反映了《天龍山藏經》與大藏經的關係。翻刻，襲用大藏經千字文，以為自身組織結構體系，是“小部藏典”共有的現象。另外，根據其牌記“版藏某某處”的說法，該經藏應該已經刊雕完成，規模結構應該已經固定，這應該是一部完整的“小部藏經”。因而可以說《天龍山藏經》將是繼南宋景定陸道元藏本、元陳覺琳報恩寺萬壽堂本、元吳興妙嚴寺本等小部藏經以外的又一部新的“小藏”，它在藏經史上將有特殊的意義。當然，其規模、結構到底如何，還有待發現更多的新資料。

《天龍山藏經》最重要的史料價值在於它的刊雕年款，由於明代初年“靖難之變”，永樂皇帝為了消除建文的影響，凡是有關建文帝的資料，盡量銷毀，凡是有建文年號字跡者，“建文”年號悉皆刪去，祇留下“元年己卯”紀年字樣。這就是今天我們很難見到明初建文時代文物的因素。由此，我們更佩服鄭振鐸先生，當年他可能並沒有機會查閱有關資料，更沒有見到普林斯敦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資料，但是，先生憑藉他的“眼光”，收集到這件稀見珍籍，保留至今，實在難得。

筆者從鄭先生收藏品中獲益良多，在此僅舉兩例，以見先生收藏品之重要。僅撰此小文，以為紀念。

【說明】此文為紀念鄭振鐸先生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暨逝世五十週年而作，曾刊登在善本部內部刊物《文津流觴》2009年12月號（總第二十五期）上，此次發表，經過修改整理。

#### 注釋：

①《西諦書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②鄭振鐸編著：《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③趙萬里：《西諦書目序》，1963年6月；載《西諦書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④《西諦書目》上卷第52葉，版本時代著錄為“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此書提入善本藏書，目錄見於《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版本時代著錄為“宋”，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589頁。

⑤刻工蔣達，南宋刻《磧砂藏》的工匠。見葉恭綽撰《磧砂延聖院小誌》，載上海宋版藏經《影印宋磧砂藏經》首冊，1935年。

⑥見陝西圖書館古籍部藏磧砂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參見《影印宋版磧砂藏經》，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影印出版，1935年。

⑦有關楊璉真佳的扉畫，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釋家類《不空羼索陀羅尼經》（存卷上）和

《不空羼索心咒王經》（存卷上中）。與此扉畫非常相似的，是現存山西省圖書館的一幅扉畫。1941年小川貫弍撰《光明禪師施入經典とその扉繪》，載《龍谷史壇》第三十號，他揭示並研究了山西崇善寺收藏之《普寧藏》“卮十二”《舍利弗阿毗曇論》卷十二，該冊卷首附有關扉畫，與鄭先生收藏品非常相似，大約出於同一版本。惟目前尚不知誰為先後，有待研究。

⑧有關楊璉真佳的研究，見陳高華《略論楊璉真加和楊暗普父子》，原載《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又見《元史研究論稿》，中華書局，1991年12月版。

⑨胡適：《記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葛思德東方書庫藏的磧砂藏經原本》，載張曼濤主編《大藏經研究彙編》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6月版。

⑩方廣錫：《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